

主编 纪宗安 马建春

暨南史学

通堂題前



第十一辑



暨南史學

JINAN SHI XUE

第十一輯

主編 紀宗安 馬建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暨南史学. 第11辑 / 纪宗安, 马建春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495-7702-6

I. ①暨… II. ①纪…②马… III. ①中国历史—
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2123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1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3 字数: 245千字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 001~1 200册 定价: 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顾问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明达 (广东)	马小鹤 (美国)	王子今 (北京)
田卫疆 (新疆)	刘迎胜 (江苏)	李锦绣 (北京)
吴玉贵 (北京)	张国刚 (北京)	张 磊 (广东)
陈高华 (北京)	陈得芝 (江苏)	范立舟 (浙江)
季塔连科 (俄罗斯)	周伟洲 (陕西)	庞晓梅 (俄罗斯)
波波娃 (俄罗斯)	姜伯勤 (广东)	章开沅 (湖北)
彭 卫 (北京)	谢和耐 (法国)	蔡鸿生 (广东)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纪宗安 马建春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建春 王元林 刘正刚 刘增合 纪宗安
李云飞 吴宏岐 张应龙 张其凡 张晓辉
陈伟明 郭声波 冀满红

编辑室

主 任 刘永连

执行编辑 秦静雅 乔志勇

目 录

从“方外之地”到“列为诸侯”

——汉初士人的“南越国”认知 杨新新/1

东魏高唐县开国男穆瑜及夫人陆氏墓志考释 王银田 李 杲/14

王士良豫州降北周事考释 黄寿成/24

隋唐南汉时期潮州的历史图景 陈占山/33

从国王到囚徒

——论高句丽王高藏“政不由己”及其入唐轨迹 冯立君/50

“素馨”考辨 刘家兴 刘永连/67

关于元代良贱通婚的身份问题

——兼谈良贱通奸所生子女的身份 乔志勇/81

颞细打宾、胡斯纳米与乌斯蒂丰考 周运中/89

桐城派与晚清史学经世思潮 曾光光 仇钰奕/98

诚信与自强：曾国藩近代民族意识的哲学基础与精神特质 王明前/106

合作政策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对天津教案的调停 张 坤 王宝红/125

宋子文与民国时期广东财政金融 张晓辉/139

宋子文与广东省营造纸厂劫物归还刍议 张维缜 周金燕/156

民国后期县域社会审贪案之司法实践(1945—1947)

——以粤西阳春县中南乡乡长罗增元贪污案为例 张晓辉 马 宁/165

暨大校史中值得细说的一页

——广州复校初期暨大历史系编修的《番禺新志》 许起山/177

与葛瑞汉(A.C.Graham)商榷《鹖冠子》书 杨兆贵 吴学忠/184

附:《暨南史学》稿件格式要求/197

从“方外之地”到“列为诸侯”

——汉初士人的“南越国”认知^①

杨新新

[提要]西汉王朝建立初期,面临“北胡南越”夹击的局面,尽管汉廷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经营“南越”的策略,但在文献资讯缺乏与“夷夏之变”观念的影响下,中原士人对国境以南的赵越政权认识相当有限。他们将先秦文献中关于“南方之越”的叙述,转化为对“南越国”的想象,将之视作偏居涨海之滨的蛮荒之地。汉武帝时期,平定南越战役结束后,“岭海越地”纳入汉帝国疆域,汉初士人笔下的“南越国”形象随之发生变化,由“方外之地”,转换为“大一统”叙述结构下与中央王朝对抗的“诸侯之国”。

[关键词]西汉;南越;士人;认知

成书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前后的《淮南子》,^②论及秦统一六国后征讨南越时,指出秦皇为“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不惜“伏尸流血数十万”,遣五路大军,挥兵

^① 本文曾提交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得到重庆师范大学李禹阶教授、南京大学成祖明副教授、江西师范大学王刚副教授等先生的批评与指正。论文写作亦蒙导师姜义华教授的悉心指导,特此一并致谢。

^② 有关《淮南子》一书成书时间之考证,见陈广忠《〈淮南子〉的成书、传播与影响》,《船山学刊》1996年第2期,第102页。诚然就刘安等编纂《淮南子》一书的立论而言,意在通过“观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权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以使“天地之理究矣,人间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备矣”,故其有相当程度的为主政者作政治宣教的色彩。然而如果注意到,著述者之立论无疑要受其所处社会语境以及知识结构的影响,可知在编纂《淮南子》一书时,刘安及其门下士客即使有采撷百家以“务为治”的考虑,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认为《淮南子》内中的部分言说,多少也反映了刘安及其门下士客乃至那时多数士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因此,《淮南子》内中对南越等相关问题的认知,某种程度上当然亦可认为其反映了西汉初年读书人对南越问题的普遍态度。

南进，“与越人战”。后越人“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历经“三年不解甲弛弩”，统帅之一“尉屠睢”被杀，^①终由任嚣、赵佗完成秦帝国定平岭南之功业。且不论《淮南子》作者刘安及其幕下士客这段秦伐越苦的记录是否有抑旧媚新之意，单就内中有“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玕”、越人“入丛薄中，与禽兽处”等句，提示了在刘安等“中国”士人的认知中，此时南越一带虽经赵氏政权经营数十年，与西汉王朝多“剖符通使”，^②但恐怕也不过是多产奇货异宝，偏居涨海之滨的化外蛮荒之地。

与此同时，成书晚于《淮南子》，即完成于武帝平定南越后之征和三年（前90）前后的《太史公书》^③，无论言及秦伐南越亦或汉与南越交攻时，绝少关于越地多“珠玕利”、越人“与禽兽处”等字句。即便有“居蛮夷中久”等记叙，^④却也是司马迁“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络天下放失旧文”而对赵佗自述的直接辑录，非著书者本人之意。事实上，检诸相关文献，从叙述结构来看，司马氏就南越以及西汉王朝与南越关系相关问题的记载，基本属“述而不作”式的一般性描写。

尽管如此，太史公对上述问题却并非没有看法。在谈及汉高祖初“定天下”后“释佗弗诛”时，太史公评论到，此系“中国劳苦”，不得已而为之。^⑤稍后其又在记录元鼎五年（前112）武帝征伐南越时，引用汉武帝谕诏言到，汉伐南越系因“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故“天子微，诸侯力政”，必出兵“讨贼”。^⑥较之刘安等人的看法，太史公更愿意将南越“比汉诸侯”，从为西汉王朝稽“成败兴坏之理”的角度，论述相关问题，而非将之简单视作化外不毛之地。

对此，后来者不禁要问，同在世宗一朝，前后相距时间不长，刘安、司马迁两方对同一问题的表述、立论何以大相径庭？这是否代表了西汉初年中原王朝士人对帝国南部边疆的两种不同认知？换言之，西汉初年，中原王朝士人对南越国之体认到底如何？是否能简单地从“后见之明”的角度出发，将之归为西汉王朝“羁縻不绝”的“荒服”之地^⑦，或视

① 《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907页。

②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2967页。

③ 关于《史记》成书时间的讨论，见罗庚岭《〈史记〉成书年代及司马迁死因考》，《人文杂志》1994年第1期，第81—84页。

④ 《史记》卷九七《郿生陆贾列传》，第2698页。

⑤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7页。

⑥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74页。

⑦ 张荣芳：《汉朝治理南越国模式探源》，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7页。

之为刘汉帝国“诸侯”“外臣”名义下的“独立政权”^①？值得重新思考^②。

一、文献缺失与观念预设：“南越”与“越”难分

据有关研究可知，从商周时期始，大部分活动于属现今南部中国范围内的人群，被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先民划归入“苗蛮”系统之中。^③到春秋战国时期，“自勾践强大而越名始著”，作为他称的“越”从与“先楚”关系更为密切的“苗蛮”表述系统中划分出来，^④被华夏社会用来泛指生活在东南沿海及南部山地之“南方民族”。^⑤此后中原士人有关“越”之文献记录随之出现。而从这一时期相关文献对“越”之记叙来看，^⑥在此类典籍的作者笔下，“扬汉之南”的“百越”，多被描述为“雕题交趾，有不食火者”^⑦的“无君之国”^⑧。他们在中原士人看来，所起的作用仅是“西面正北方”贡献方物“海蛤”“文辱”“玄贝”等^⑨，

① 刘瑞：《南越国非汉之诸侯国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第19页；黎明钊、林淑娟：《汉越和集：汉唐岭南文化与生活》，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70页。

② 目前学界已从《史记》《汉书》等正史中异族传之编排、叙述模式入手，讨论了两汉时期士人关于异族知识谱系之建构。参见胡鸿《中古前期有关异族的知识建构——正史异族传的基础性研究》，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编委会《中国中古史研究》第4卷，中华书局，2014年。与此同时，研究者亦就赵越政权对中原王朝之政治认知作了初步探索。参见朱圣明《试析南越由“蛮夷”向“半蛮夷”的身份转变及认同变迁——兼论南越灭亡之内因》，《广西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而关于西汉初期中原王朝士人对南越国认知的讨论目前尚付阙如，现存之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对秦越、汉越关系史的考察。参见余天炽等合著《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27、204—219、224—235页；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205页；刘敏《“开棺”定论——从“文帝行玺”看汉越关系》，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中山大学历史系、西汉南越王博物馆编《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第23—29页。

③ 陈国强等：《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页。

④ 俞伟超：《先楚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第10页。

⑤ 蒙文通：《越史从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⑥ 根据目前研究来看，下引《礼记·王制》篇、《吕氏春秋·恃君》篇、《逸周书·王会》篇以及《墨子·节用》篇等文献，基本完成于春秋战国前后（参见陈奇猷《〈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与书名的确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5期，第103—104页；王锸《〈礼记〉成书考》，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第95—105页；唐元发《〈逸周书〉成书于战国初期》，《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179—178页；李光辉《〈墨子〉成书年代及著者考证综述》，《殷都学刊》2006年第4期，第103页等）。因此或可以认定内中关于所谓“越”之叙述，大体属先秦时代士人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⑦ 《礼记》卷三《王制》，中国书店，1994年，第114页。

⑧ 《吕氏春秋》卷八《恃君》，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04页。

⑨ 《逸周书》卷七《王会》，齐鲁书社，2000年，第82页。

以“宾服”于中原诸国^①。

与此同时,无论是成书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前后之《淮南子》一书中南越地多“犀角、象齿、翡翠、珠玕”等“异物”之记载,还是早在吕后五年(前183)吕氏家族颁布的“禁南越关市”政令中“别异蛮夷”之态度,^②皆与上引《逸周书》《吕氏春秋》等先秦文书中描写的“扬汉之南,百越之际”的表述结构何其相似。可见,西汉初年尚存先秦典籍对那时一般士人乃至汉帝国高层有关南越问题观念形塑的影响。

那么为何西汉初年一般士人关于南越问题的认知,与产生于周秦易代之际的典籍中所载之“越”之形象如此接近?这很可能与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居住在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受囿于活动范围,^③以及交通往来不便等问题的影响,对地处千里之外岭表等地人群的了解非常模糊有关。

尽管已出土的考古材料显示,中原地区或可能早于商周时代便与岭南交广等地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互动。^④而稍后流行的颛顼“南至于交趾”^⑤、尧“申命羲叔,宅南交”^⑥、舜葬于“苍梧之野”^⑦等传说,也提示了那时中原文明对粤江流域文化的浸染。^⑧不过,这样的互通交往程度无疑非常低下,双方能够获取的直接、有效的信息实际相当有限。迟至春秋战国时期,“南越有邑”的说法方才见诸中原士人所撰之相关文献中,便是这一问题的反映。^⑨

而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华夏社会能够第一次直接获取岭南地区情况的时机应出现

① 《墨子》卷六《节用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44页。

②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9页。

③ 根据王明珂教授的研究,迟至春秋时期,正在形成的“华夏”人群,通过“太伯奔吴”等传说,将其南部边缘范畴推移至今天的两湖、江南等地,即历史上的“越”“楚”等地(当然这个“越”地不包括“南越”)。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3—164页。

④ 有关先秦时期,中原文明与岭南地区的交往,参见杨式挺《试从考古发现探索百越文化源流的若干问题》,收入杨式挺《岭南文物考古论集》,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第90页;徐恒彬《秦统一岭南的社会文化基础——兼论番禺(广州)是岭南最早的首府》,收入徐恒彬《华南考古论集》,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125页。

⑤ 《史记》卷一《武帝本纪》,第11页。

⑥ 《尚书·尧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⑦ 《山海经》卷一五《大荒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77页。

⑧ 上引《尚书·尧典》《山海经·大荒南经》等传说所产生之时间,即典籍的成书时间,见李娟《〈尚书·尧典〉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0年,第28—30页;王建军《从存在句再论〈山海经〉的成书》,《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143页。

⑨ 《庄子·山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1页。有关《庄子·山木》篇成书于先秦时代之考证,参见王发国《从〈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推测〈庄子〉之成书年代》,《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第119页。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公元前 219 至前 218 年前后,完成统一未久的秦帝国便发动了对南越等地的征伐战争。^①很可能因为这次战争,秦帝国直接获得了有关南越地区的部分情报。这从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②并任命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③正式将南越等地纳入帝国治理结构中可知。此后,秦始皇又数次“谪治狱吏不直者”至“南越地”。^④迟至“陈胜吴广发矣”前“不一年”(前 210)前后,任嚣、赵佗等亦还在上书“求女无夫家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而“秦皇帝”亦“可其万五千人”。^⑤足见当日中原地区与南越等地互动往来之密切。

不过纵然如此,有秦一代,中央王朝对南越地区的实际统治力与认知力却相当有限。就在陈胜吴广事发前后,手握专制一方大权的任嚣即为“王越计”着手策划,准备据岭而守。^⑥而继任“东南一尉”的赵佗,更是在“豪杰叛秦”“中国扰乱”的局面下,^⑦迅速称王自立,这无疑从反面说明,秦帝国中央对“道里辽远”、旧有势力强大的南越等地的鞭长莫及。因此,即使通过征伐战争与地方行政架构的建设,秦帝国中央或许能够部分获得南越地区的相关讯息,但由于无法对其进行直接、有效的经营,这类讯息势必相当有限与散碎。这恐怕是先秦、秦代有关南越问题文书简帛缺乏的重要原因之一,亦成为西汉初年,始建未久的中原王朝难以摸清岭南相关情况的重要阻碍之一。^⑧

事实上,由于此前有关南越地区文献的缺失,公元前 204 年前后,赵佗借口岭北紊乱,“盗兵且至”,遂“绝道聚兵自守”,^⑨建立南越国,隔断与中原地区交通来往。而七年楚汉征战,精力主要集中于关中、山东一带,这导致公元前 202 年西汉帝国建立时,刘汉集团实际对偏居岭表的赵越政权之认识非常欠缺。此后,尽管从高祖十一年(前 196)委派陆贾出使南越,至元鼎五年(前 112)四月武帝下令韩千秋、樛乐平吕嘉乱,西汉中央王朝一直与南越国互通有无,并试图收集有关南越地区的各类信息。但从其间吕后盲目颂

① 有关秦平岭南具体开始年代等问题,目前学界尚存争议。然而无论何种说法,基本认定公元前 219 至前 218 年前后,秦帝国对南越等地的征伐战争已然发动。相关争论参见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第 18—24 页;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南越史研究小组”《赵佗与南越国——关于赵佗入越几个问题的思考》,《广州文博》,2011 年,第 6 页。

②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 253 页。

③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 2967 页。

④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 253 页。

⑤ 《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第 3086 页。

⑥ 梁廷枏:《南越五主传·先主传》,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年,第 13 页。

⑦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 2967 页。

⑧ 当然,这类文献的缺失,不能说明历史上相关文献不存在。发生于的秦末楚汉之争,很可能就导致了上述文书的散失不传。但无论如何,先秦、秦代,主要活动范围在关中、山东一带的士人对南越等地的认知非常有限,却也是毫无疑问的。

⑨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 2967 页。

布“禁南越关市”政令,激怒赵佗,“乘黄屋左纛”“与中国侔”,^①以及元鼎四年(前113)武帝在处理南越国内附问题上的失误,可知即便经过高祖以降八十余年的来往,地处关中平原的西汉帝国中央对岭南问题虽已有一定了解,但认识依然极为有限。^②

因此,可以认为源于有关赵越政权资讯的贫乏,至少在元鼎五年(前112)秋武帝以“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平定南越前,^③中原王朝对帝国南疆的知识储备极为不足。这亦导致此段时期以前,主要生活在关中地区的西汉王朝士人想要对交广等地有所理解,势必只能更多从汉廷与南越国使节为数不多的几次接触,以及在可以参阅的先秦时代存留下来的有关“越”(非单指“南越”)之文献中去追索。^④

当然,如果说稍前典籍缺乏,对“南越”问题的认知不足,使西汉初年中原士人很容易将先秦文献中关于“越”之叙述转化为对“南越”问题之想象的话。那么先秦以降发轫的“夷夏之别”的观念,经汉初杂糅如“黄老之学”后,到武帝初年董仲舒提出“大一统”学说,把外攘无君“四夷”、使“天下率服”与“以德怀远,说德归谊”作为中原王朝“羁縻”边疆的内在追求,^⑤则更是加深了汉初士人的上述看法。而将中原王朝“武功”尚未波及的南越,视为“声教不及”、多产“犀角、象齿、翡翠、珠玕”利之“禽兽”处,^⑥正是此类理念支配下的具体体现。^⑦

是故,西汉初年尚存的先秦时期华夏社会关于“越”地之记载,以及春秋战国以来中原文明正在形成的“大一统”王朝边疆羁縻论,无疑从学术与思想认知的延续上,影响了元鼎五年(前112)前汉帝国士大夫对南越国的记叙与想象。这亦是何以迟至建元二年(前139)前后,作为藏书大家的刘安尚在其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将岭南交广地视作多产奇货异宝、朝贡络绎不绝的蛮荒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9页。

② 有关西汉初年中央王朝与南越国关系如何影响到西汉初年士人对南越国的认知,论者将在后章作专门讨论。

③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74页。

④ 汉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令”,此后春秋战国以来民间留存的私人藏书得以公诸于世,这也使刘安、司马迁等人有机会阅读到先秦时期的相关典籍。参见陈静《西汉“除挟书律”的历史意义》,《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第45页。

⑤ 陈友冰:《先秦两汉羁縻考》,《安徽史学》2000年第1期,第3—9页。

⑥ 《淮南子》卷一八《人间训》,第1907页。

⑦ 尽管有研究者已从儒道互争的角度指出,刘安尚“黄老之学”,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相左。(康清莲:《淮南王刘安谋反案之再分析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第117页)但考虑到《淮南子》实为集体编纂,“道儒各家驳杂”,而儒道两方对于了解有限的“蛮夷”之地,虽处理态度不同(一方主张“以德化之”,一方主张“无为而治”“不足烦中国”),但描述、认知却基本相近(“无君无父”“王教不及”),可知《淮南子》内中部分认知与持“大一统”理念之汉儒,或有相通之处。

二、重“胡”轻“越”：相对忽视“南越”的时代语境

诚如上章所言，文献缺乏与观念的预设，从认知层面致使元鼎五年（前 112）前西汉王朝士人将已由河北赵氏建立政权的南越等地，仍然描绘为“非有城郭邑里”，且“蝮蛇蠹生，疾病多作”与“中国”有别的化外之乡。^①与此同时，中原刘氏王朝建立后未久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特别是其与包括赵越集团在内之周边政权的关系，则从现实情境的层面，限制了那时一般士人扩充对南越问题认知视野的机会，进而影响了他们对此类问题的判断。

受战乱之影响，“汉兴”以来，“接秦之敝”，国力衰微、经济破败，“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以致出现“民相食”“天子不能具醇驷”等困境。^②与此同时，从汉高祖五年（前 202）“燕王臧荼反”始^③，至汉高祖十二年（前 195）卢绾北入匈奴^④，楚汉争战期间被刘邦册封为王，势力“夸州兼郡”、雄踞一方的异性将领，先后倒戈相向，发动叛乱。因此，西汉初年，刘汉政权的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恢复社会经济，剪除异性诸侯王，强化中央权势。而对漠北“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匈奴，以及岭南“异梦离心”的赵越集团，刘邦则采纳了陆贾以秦为鉴、“无为而治”的策略，仅是徒封韩王信、衡山王吴芮于太原、临湘（今长沙）分别予以牵制。^⑤

西汉王朝始对“北胡南越”态度发生重大转变当在汉高祖七年（前 200）刘邦兵败白登山后。自知彻底无力“武服”天下，刘邦一方面接受刘敬“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的建议，与匈奴“结和亲约”。^⑥另一方面，稍后不久，又派陆贾出使南越，希图使赵佗“和辑百越，毋为南边患害”。^⑦

尽管既往研究以“王朝大一统”的视角肯定了陆贾出使南越的功绩，并认为其对汉帝国安治南部边境作出了“重要贡献”。^⑧然而，从陆贾会见赵佗时，对“中国人”出身的赵佗“弃冠带”、从“魑髻”等越俗的反感与不耻；^⑨以及汉廷中央发出立赵佗为南越王诏，内中尚强调粤人俗“好相攻击”，赵佗“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不耗减”等语，^⑩可知通过陆

① 《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78—2779页。

②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第1127页。

③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58页。

④ 《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第2638—2639页。

⑤ 《史记》卷九三《韩信卢绾列传》，第2633页。

⑥ 《史记》卷九九《刘敬叔孙通列传》，第2719页。

⑦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7—2968页。

⑧ 林风：《陆贾与汉初政治》，《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第7页。

⑨ 《史记》卷九七《郿生陆贾列传》，第2697—2698页。

⑩ 《汉书》卷一《高帝纪》，第73页。

贾访越,西汉帝国虽对南越情势已有了初步认识,但既存周秦文献中“居高临下”、视越人为域外蛮夷“他者”之观念犹然可见。

事实上,陆贾的上述态度也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汉初士人关于南越问题的固化“共识”。吕后五年(前183),掌控汉廷大权的吕氏集团,公开打出“别异蛮夷”等歧视性旗号,下令断绝与南越国交往,无疑便是汉初士人抱持上述理念之反映。^①而迟至建元六年(前135),因受闽越攻讦,南越王赵昧上书请汉武帝发兵干预,淮南王刘安等尚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越人“不受正朔”,自相攻击者为常事,“不足烦中国”往救之,^②可见这类观念在那时的深入人心。

由于陆贾出使南越的行动属汉越双方初次接触。如果说这之前,囿于赵越政权“负山阻海”,自立于千里之外,刘汉集团士人对其缺乏了解的话。那么此后,汉初士人在明知南越国不但“颇有中国人辅助”、且实为“中国人”掌控的情况下,仍然以自诩“中州”的立场,将之视作“不居之地,不牧之民”,^③一方面当然是受典籍匮乏与观念先入为主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汉初以来,“北胡南越”中“北胡”一方气焰日盛,无论汉廷中央或是一般士人,将主要精力聚焦于渐成“心腹之患”的匈奴,对偏安岭海、难敢轻开“边衅”的南越,未引起足够重视,可能亦是汉初士人固守陈见的重要原因。^④这从汉越交往后,汉廷中央对“北胡南越”之不同处理策略中可以窥见。

惠帝三年(前192),就在南越赵氏向汉王朝“称臣奉贡”后未久,日益“浸骄”的冒顿单于致书吕后,不但公然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对汉王朝进行威胁与恫吓。且以“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等侮慢之辞,戏弄与羞辱刘汉皇室。尽管震怒之下,吕后欲“议斩其使者,发兵而击之”,但经季布等从中力谏,考虑到并无必胜的把握,吕后决定忍气吞声,向冒顿献马,继续与之“和亲”。^⑤

与此同时,吕后在处理同属“异邦”的南越问题上,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如前文所言,吕后五年(前183)春,“以有司请禁绝南越关市,金铁、田器,及马、羊、牛、畜毋得市以牝,著令于边”。闻讯后的赵佗先后派遣“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等“入朝谢

①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9页。

② 《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77页。需要指出的是,刘安等上述关于越人为“化外之民”的看法,固然与其当日反对汉武帝等出兵经营南方,以免汉廷中央军队到来威胁到淮南等国之生存有关。但如果考虑到“七国之乱”后各诸侯王权势力被削弱,基本无力对抗汉廷中央,刘安等恐无太多觊觎之心,则上述看法从侧面亦反应了最熟悉南越问题的淮南国乃至当日汉廷一般士人对南越问题的认知与想象。又见陈广忠《试析刘安冤案》,《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③ 《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77页。

④ 宋超:《“癰疥之疾”与“心腹之患”——南越匈奴与秦汉王朝关系比较研究》,收入丘权政主编《佗城开基客家安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第272页。

⑤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第3754—3755页。

过”，请求改变政策。^①吕后非但扣留了三位使者，更是公开宣布与南越国断绝“蕃臣”关系。^②

有研究指出，吕氏集团掌权后与南越国绝交，或可能关涉其“以吕代刘”后“宣威揽权”等问题。^③诚然，吕后专政，大封诸吕为王，有违汉高祖定下的“非刘氏不得王者”之“白马之誓”，^④因此，与赵越政权禁边、断交，有助于笼络早就觊觎于岭南三郡的异姓长沙王国，扩大吕氏集团的统治基础，同时也是其向内外各方立威之绝好机会。不过，考虑到较之匈奴，南越赵氏政权从实力上说，尚不足对西汉王朝构成威胁，吕后这一“宣威揽权”的行动，多少有“欺软怕硬”的嫌疑，这从侧面也表明了汉王朝内部对南越问题的“轻视”。

公元前179年，吕后去世，陈平、周勃等诛灭“欲发乱关中”的吕禄、吕产，迎立代王刘恒即位。就在文帝登大宝后未久，赵佗通过遗书驻守长沙国的隆虑侯周灶，希图“与汉和”。^⑤对此，西汉王朝中央迅速作出反应，不但“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解除其“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的疑虑，同时罢免屯驻长沙国的“将军博阳侯”，并派遣年过古稀的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赐书赵佗表示“服岭以南，王自治之”。此后，赵越政权遂“去帝制黄屋左纁”“复故号”，汉越双方“通使如故”。^⑥

西汉王室之所以急于调整对南越方面的策略，固然与刘恒以“代来即位”，希望告谕诸侯四夷，以期宣化“盛德”有关。^⑦但更为关键的是，文帝即位后，匈奴数次侵扰西汉帝国北境，在无力同时应付北胡南越“两劲”的情况下，及时修好与“非敢有害于天下”的赵氏集团的关系，^⑧可使汉廷集中力量抗击“北胡”，免去“背腹受敌”之忧。这一方面当然显示了刘恒“贤天子继出”的务实，^⑨另一方面却也提示了较之盛气骄横的“北胡”，“南

① 梁廷相：《南越五主传·先主传》，第7页。

② 黄庆昌：《论西汉王朝与南越国的关系》，《南方文物》2003年第3期，第74页。

③ 广州市文物博物馆学会“南越史研究小组”：《赵佗与南越国——关于赵佗入越几个问题的思考》，第15页；边晶晶：《汉初楚籍功臣对南越国政策浅析》，《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2页。

④ 张荣芳、黄森章：《南越国史》，第192页。

⑤ 梁廷相：《南越五主传·先主传》，第8页。

⑥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表面上赵佗虽向文帝表示此后不敢“妄窃帝号”，但汉王朝可能非常清楚，其在南越内部依旧“窃如故号名”，不过这却并不妨碍此后汉越双方关系的交好，见《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2—3853页。

⑦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70页。

⑧ 《汉书》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3851页。

⑨ 梁廷相：《南越五主传·先主传》，第13页。

越”在汉人认知中“绵力薄材”，不甚重要的地位。^①

事实上，从孝文帝以“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为由，否决将军陈武提出征伐南越的计划，与赵佗“结和通使，且无议军”始，至建元五年（前136）赵昧上书请“天子诏”干预两越纷争，汉武帝派“两将军往讨闽越”，事后又令唐蒙、严助“谕意风指”南越，赵昧遂“遣太子婴齐入宿卫”，^②汉越双方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止。由于几十年来帝国南部边疆向无战事，天子之兵未尝“入其地也”，^③因此汉廷朝野有关对外问题处理之认识，无论是“修文而和亲”，或是“用武而克伐”，^④仅关乎“北胡”，而不涉及“南越”，这也反证了汉初士人对“南越”问题的相对“忽略”。

是故，可以认为，正是西汉初年，刘汉王朝面临的外部危急形势，使汉廷朝野各方将关注焦点集中于北方的匈奴政权，无力亦无机会认识与了解“岭海越地”。这也成为迟至建元年间，在汉帝国正式发动对赵氏政权的王朝征伐战争前，对“南越”情势最为熟悉的淮南王刘安，尚有将之视作民多“断发文身”、不服“冠带”的“方外之地”的另一重要原因。

三、识随势变：从方外之“越”到诸侯“南越”

史载，汉武帝继位后，由于经过“汉兴七十余年间”休养生息，“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西汉王朝国力大增。^⑤随着北方匈奴问题的逐步解决，意欲使“天下万国莫敢不悉靖共职受命”的刘彻，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名为外臣，实一州之主”的南越国。

如前所述，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在“大行王恢击东越，东越杀王郢以报”后，曾派唐蒙、严助两次“风指晓南越”，^⑥为此，南越国主赵昧不得不“遣太子婴齐入宿卫”。汉廷中央也很可能通过“寄居长安”的赵婴齐，加深了对“南越”问题的了解。^⑦与此同时，出使南越的番阳令唐蒙则因无意间食到“蜀枸酱”，发现了“浮船牂柯江”至“番禺城”下的

①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六《器语》，中华书局，1985年，第446页。

②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70—2971页。

③ 《汉书》卷六四《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2777页。

④ 《汉书》卷九四《匈奴传》，第3830页。

⑤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20页。

⑥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4页。

⑦ 从赵兴继位后，汉廷立即派出与穆太后有“私通”的安国少季赴南越“谕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内诸侯”推测，汉廷很可能通过赵婴齐获悉了南越国中越人势力较大的问题。而赵婴齐以穆氏为“姬”，很可能也是汉廷一手策划，意在南越国中培养“亲汉”势力，为以后彻底解决“南越”问题作准备。这从反面也说明，赵婴齐“入质”后，汉廷对“南越”问题更为了解。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71—2973页。

水道,他据此上书朝廷,拓展了中原汉人有关帝国南疆的地理知识。^①而到元狩三年(前120),了解到“习水战”对征伐南方诸越重要性的汉武帝,又下令“发谪吏穿昆明池”以训练楼船。^②刘汉集团的上述行动表明,较之高祖、文景时代,西汉中央政府在汉武帝登基后,对南越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在对南越问题的总体策略上,亦从汉武帝以来之安抚、防备为主向战备、征伐方面转变。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考虑到,汉武帝并未在建元六年(前135)趁出兵闽粤之际解决南越问题,系因匈奴问题受到牵累,^③以及迟至元狩四年(前119),经卫青、霍去病率大军深入漠北出击,匈奴最终“远遁,而幕南无王庭”,^④西汉王朝“心腹之患”才基本消除。可知刘彻执政前期,即便汉廷中央已从军备的角度留意“南越”问题,并获取了较此前更为丰富的资讯,^⑤但其对外关注之重心仍在国境以北,汉王朝一般士人对“南越”问题之认知,较之从前应并无太多变化。

西汉士人对南越问题认知发生重大转变应出现在元鼎五年(前112)秋,汉帝国以“天子微,诸侯力政,讥臣不讨贼。今吕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为名,起“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大规模发动对南越政权的王朝征伐战争以后。由于南越军队“据险以守”,战事进行得非常惨烈。至元鼎六年(前111)秋,番禺城降,吕嘉、赵建德被擒,战争才告结束。^⑥而这场持续一载的兵燹,也使处身中原的一般士大夫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南方。史学巨擘司马迁依凭当日“石室金匮”中的档案文书,对战事作了详尽的记述,便从反面提示了那时汉王朝内部各方对“南越”问题的关注。

汉军平定赵越集团后,汉廷中央“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个“初郡”,委以“南方吏卒”直接治理之。^⑦王朝权力进入南越“旧疆”核心区域,并未受到太多抵制,不但使汉人更易获取“南越”问题的有关信息,也很可能使西汉士人意识到,赵氏政权治理下的南越国,虽“百越杂处”,赵姓王室也颇以“蛮夷大长老”自居,但至少在赵越政权能够实际掌控的地区,其治理“甚有文理”,与中原情势

① 《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3—2994页。

② 《汉书》卷六《武帝纪》,第177页。

③ 《史记》卷一〇八《韩长孺传》,第2861页。

④ 《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第2911页。

⑤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汉文帝“罢将军博阳侯”与赵佗“结和通使,且无议兵”,到刘彻登基加强对南方的军备前,西汉王朝在国境内部对南越国并无军事准备。事实上,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产生于公元前168年左右的《驻军图》可以看出,至少从汉文帝乃至更早时期始,为防患“南越”问题,汉军便一直驻扎在南岭山脉越城岭至骑田岭一线。参见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文物》1975年第2期。

⑥ 《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75—2976页。

⑦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40页。